

疲竭之愛：李箱與翁鬧作品中的 現代愛，及其不滿

陳佩甄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聚焦討論台韓殖民日常政治中的矛盾性，此矛盾性體現於現代愛追求過程中永恆的挫敗與耗費，我將之稱為「疲竭之愛」。二十世紀初期東亞各地出現了大量的戀愛論述，將現代愛的各種概念創造、翻譯、轉化進入在地文化實踐中，並據此建構現代個人主體。殖民知識分子圍繞「愛」這一主題生產的諸多論述，更反映了現代文明與殖民現代性的複雜問題。美國人類學家伊麗莎白·普維內利（2006）曾以「親密事件」命名殖民情境中的規範性力量；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乃是透過愛的論述，重新調整這些場域、模糊地域和關係的界線。據此，本文將在論文前半分析台韓殖民文學中「愛」的制度化、及其中反思殖民現代性的傾向，後半特別聚焦討論翁鬧的〈天亮前的愛情故事〉與李箱的〈翅膀〉。這兩篇小說皆發表於日本皇民化政策實施與戰時總動員前夕，並被視為是現代主義的高峰期作品；且這兩篇小說的作者背景、歷史時空、獨白敘事、戀愛主題有著高度的同質性，可視為台韓被分隔為殖民地的情境下，仍可透過反思被殖民與反殖民的經驗進而互為參照的例子。再者，本文認為小說中共同展現的與「非典型」女性的親密關係、與被殖民者的都市經驗，在在揭示了現代主體的殖民矛盾性。小說主

角們耗盡力氣追尋的理想之愛、錯認的親密關係，反映的是被殖民主體窮盡自身現代化的可能性，亦同時挑戰了現代性內部的矛盾、及其隱含的帝國主義內涵。

關鍵詞：浪漫愛、殖民現代性、性別、李箱、翁鬧

Exhausted Love: Modern Love and Its Discontents in Yi Sang and Weng Nao's Novels

Chen, Pei-Jea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colonial ambivalence that embodied in the pursuing of modern love and represented as what I term the “exhausted love” in the colonial daily life of Taiwan and Korea. The discourses on love were explosively produc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ast Asia; conceptions of modern love were created, transformed, and translated into local cultural practices in an effort to modernize the individuals. The writings and columns encompassed free love, marriage, and sexual issues by local intellectuals demonstrate the specificity of interior modernization and addresses complex issues of colonial modernity. However, the modern love is represented as what Elizabeth Povinelli (2006) terms “the intimate event” as a powerful regulative ideal, functions in the colonial situation by tracing how the conceptions of love are produced in the intersec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bondage.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focuses on love which fetishized and commodified in/with the literary works and intersected

with the (anti-) modern consumption culture. The two novellas that will be examined in this paper—“*A Love Story Before Dawn*” by Weng Nao and “*The Wings*” by Yi Sang —were written and published right before Japan’s acceleration of assimilation policy and total war mobilization starting in 1937, and are often regarded as the pinnacle of modernist colonial fiction. These two novellas are narrated through monologues, and best represent the ambivalence of modern individual subjects, who exhausted the possibility of love (the symbol of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narrative (means of self-representation). As this paper argues, the love of exhaustion is a sign for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on colonial modernity. The colonized exhausted the form and material of being modern, and these experiences of the colonial subjects resulted in a challenge to modernity and its imperialist ideology.

Key words: Romantic Love, Colonial Modernity, Sexuality, Yi Sang, Weng Nao

疲竭之愛：李箱與翁鬧作品中的 現代愛，及其不滿*

一、前言

「現代愛」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二十世紀初以降東亞各地社會關係的建構與發展；而殖民地台灣和朝鮮，在現代化、國族建構的慾望下，為因應帝國主義及殖民統治，在社會親密關係的發展上也面臨急劇轉變¹。此一時期，日本帝國和殖民勢力開始在亞洲擴張，導致了殖民台灣與朝鮮社會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各種社會改革，從傳統社會制度過渡到現代殖民社會的急遽變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愛的無意識：台韓殖民現代『性』的系譜學」(MOST 109-2410-H-004-160-)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詳細審閱、斧正，提供寶貴修改意見，受益良多，特此致謝，然最後文責由我自負。

¹ 關於東亞各地、特別是涵蓋戰前的相關研究，請見：McLelland, Mark J., and Vera C. Macki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xuality Studies in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佐伯順子，〈「色」と「愛」の比較文化史〉(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江刺昭子，〈愛と性の自由「家」からの解放〉(東京：社会評論社，1989年)；Suzuki, Michiko, *Becoming Modern Women: Love and Female Identity in Prewar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Frühstück, Sabine, *Colonizing Sex: Sexolog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권보드래，〈연애의 시대：1920년대 초반의 문화와 유행〉(서울：현실문화연구，2003年)；서지영，〈역사에 사랑을 묻다：한국 문화와 사랑의 계보학〉(서울：이숲，2011年)；吳婉萍，〈殖民地臺灣的戀愛論傳入與接受——以《臺灣民報》和新文學為中心 1920~193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徐孟芳，〈「談」情「說」愛的現代化進程：日治時期臺灣「自由戀愛」話語形成、轉折及其文化意義——以報刊通俗小說為觀察場域〉(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年)；張競，〈近代中国と「恋愛」の發見〉(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化。也是在此期，自由婚姻和婚姻改革的聲浪首先開始發酵，接著浪漫愛／自由戀愛的倡議，在文學和社會改革的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一東亞社會、乃至全球共享的浪潮，在文學生產中留下重要的紀錄。

如日本學者佐伯順子在專著《「色」與「愛」的比較文化史》（1998）中指出，明治時期的日本文人、知識人透過引進西方基督教的「love」概念改革傳統社會的婚姻關係，但也因此將「性（色）」「愛」分離、並賦予優劣之分：即，現代愛成為文明精神象徵，是進步文人的追求，與之相對的則是無愛的肉慾，在文學作品中漸被壓抑消除。如最常被討論的坪內逍遙（作家，1859-1935）與其《當代書生氣質》（1885）、以及廚川白村（學者、評論家，1880-1923）在其提倡「戀愛至上主義」的《近代的戀愛觀》（1922）中，都提出了「戀愛有中、上、下品」之分，而不同品級對應的判斷準則，指向「性行為」的有無²。佐伯並未進一步申論的是，愛不同品級對應的也是不同的社會身分（例如，妓女無愛而性根本不被談論）。這並不僅止於概念上的建構與轉變，同時也在實質的社會生活層面發揮影響。當愛成為主流價值，呼籲每個人都能追求愛，實質上隨之而來的問題卻在於「愛為何也有優劣之分？」

當然，「愛」的內涵也隨著文明化、現代化的進程而有所轉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李海燕在其著作《心的革命》（2006）即歷史化了「愛」在二十世紀前半世紀的中國、如何經歷了「儒教」「啟蒙」「革命」等三個交疊時期，而形成中國特有的「感覺結構」³。李海燕透過分析各時期重要的文學作品，並將文學表現裡頭的「愛」重構為一種道德論述，在三個時期分別展現為「發乎情止乎禮」、「改革傳統的自由之愛」以及「兒女英雄般的革命之愛」，因而愛指的不僅是「浪漫愛」，還是對父母、國家乃至其他人類的愛。然而，正是李海燕如此忠於呈現儒家、五四、革命知識分子文人對於「愛（情）」的解讀與實踐，將之昇華為道德情感，而無法（或無意）進一步揭示此道德階序背後的隱含的各種意識型態，甚至迴避對於性與慾望的討論⁴。

² 佐伯順子，《「色」と「愛」の比較文化史》（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頁9-12。

³ 這個說法即是借用自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structures of feeling」。

⁴ 相關論點請見此評析：Laughlin, Charles, "Review of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 July 2011

上述中日研究雖然紮實地梳理了「愛」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並論及在現代化初期的東亞社會有何歷史性的影響。然而「現代愛」的問題，非在概念定義上追究「愛」所指為何，而是以其名而運作之權力系統，建構了什麼樣的價值體系與差異主體。如美國人類學家伊麗莎白·普維內利 (Elizabeth A. Povinelli, 2006) 以「愛之帝國」(the empire of love) 作為她理解殖民地的親密性、社會性與身體的核心概念。普維內利指陳，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乃是透過愛的論述，重新調整這些場域、模糊地域和關係的界線⁵。受此概念啟發，我認為這也點出了日本、台灣和朝鮮之間交錯連結的關係，乃反映自殖民時期關於自由戀愛、性的論述生產和相關性主體出現。更進一步來說，普維內利對於「親密事件」(the intimate event) 的概念有助於我理解台韓殖民／帝國之愛的遺緒。普維內利將「愛」視為理論化「親密事件」的基礎，「愛」代表了一個契機的來臨：自由選擇透過「愛」的概念獲得一種特別現代的政治牽引，並強化其自身的社會建構。如果我們檢視二十世紀初期在世界各地浮現的「新女性」(new women 或 modern women)，這個新興主體的主要特質之一就是：她們可以自由戀愛。「自由」進入了夫妻間的連帶關係，相互自我指認、參與構成這樣的關係，這即是(西方)現代主體的基礎概念、並相對於「傳統」(本土或非西方)的關係模式。一如「愛」在二十世紀東亞各地成為一個社會現象之時，即與「文明」「現代」「國族建構」等論述一同登上舞台，並且很快地被自然化為一個普遍、透明的存在。然而在上述分析中未能彰顯的問題是：殖民台朝在這波跨國現代愛熱潮中的位置為何？這兩個社會對於現代愛的全面擁抱，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而形成、反映什麼樣的殖民意識？

(來源：https://u.osu.edu/mclc/book-reviews/revolution-of-heart/?fbclid=IwAR19C_WgyCb-thnW8OchwCd6L14U1OEYRHL5WxjVSvLyxc6W4ysOjB2vbRg，2022年1月24日)。

⁵ Povinelli, Elizabeth, *The Empire of Love: Toward a Theory of Intimacy, Genealogy, and Car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二、殖民之愛：現代愛的制度化

「沒有婚姻的戀愛是可以想像的，反之則未然。」(李光洙，〈我對婚姻的看法〉，1917年)⁶

「一般可憐的人，對於兩性關係，只知道有性交和生殖作用，而不知有尊貴的神聖的戀愛，這班人實在是沒有生的價值的可憐人……」(張我軍，〈至上最高道德——戀愛〉，1925年)⁷

朝鮮在 1894 年開始的甲午改革，在國家主權建立、社會階級廢除、韓文的提倡、婚姻制度改革等，皆有明確改革進程。特別是婚姻改革促成禁止童婚(將結婚年齡提高至 20 歲)、寡婦可改嫁等制度性變革，其核心精神即為「自由婚姻」的倡導。在一九〇〇年代，婚姻依舊是社會親密關係的主要形式，但此時各個社會主體(不同的階級性別年齡)間的階層關係已在「文明啟蒙」「新國民」運動中、因為「自由」「平等」等價值的倡導下逐漸鬆動。如〈男女同等論〉⁸這樣的文章雖然將個人特質與家庭背景分開來看，門當戶對已不是擇婚的必要條件，但也同時將優生學(聰明健康男女的配對)引進婚姻體制；又如《獨立新聞》社論⁹所宣導的，認為這將有助於促進民族的文明化。特別是 1919 年三一獨立運動失敗後，政治上的挫敗讓朝鮮知識分子訴求個人自主；「自由婚姻」的口號很快由「自由戀愛」取代，表明社會變革同時影響了殖民知識分子對現代愛的塑造。

需要特別註明的是，英語「love」或漢字「愛」，在韓語中主要有兩個翻譯：「연애」和「사랑」。根據韓國文學研究者 Kwon Boduerae 的研究，兩者之間的顯著差異則是：「(翻譯後的)연애這個字眼僅指涉男女之間的愛。來自／對於上帝、人類、父母或朋友的愛不是연애。……사랑這個詞……是廣為人知的，來自사랑하다這個詞，且長久以來用於『想到／感覺』之意。……基

⁶ 李光洙，〈婚姻에 對한 管見〉，《學之光》第 12 號(1917 年 4 月 19 日)，頁 29。

⁷ 張我軍，〈至上最高的道德——戀愛〉，《臺灣民報》第 75 號(1925 年 10 月 18 日)，頁 14。

⁸ 崔寅澤，〈男女同等論〉，《大韓每日申報》，1907 年 7 月 3 日，第 1 版。

⁹ 不著撰者，〈論說〉，《獨立新聞》，1898 年 2 月 12 日，第 1 版。

督教進來後，사랑逐漸廣泛地用於表示上帝的愛。到了 20 世紀，這個詞也被用於民族論述……사랑首先在上帝和國家的背景之下有了正當性」¹⁰。Kwon 認為，「在整個 20 世紀，愛在基督教和愛國主義的影響下成為一個公共價值，因為基督教宣揚愛的倫理，並強烈鼓勵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國家的熱愛和熱情」¹¹。但即使「연애」和「사랑」所指不同，但在意識型態上有諸多重疊之處。韓國現代文學之父、社會改革運動家李光洙（1892-1950）曾以「愛」為題書寫多種長短篇小說¹²與社論，並以「情」的文學論、及第一部以純韓文書寫的長篇小說《無情》（1917）奠基韓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他個人的婚姻關係也經常被視為是現代自由戀愛婚的代表¹³。當李光洙開始在《每日申報》連載《無情》時，他發表了〈我對婚姻的看法〉¹⁴一文，並陳言「戀愛是個人幸福中最大的幸福」，而「進化的戀愛最重要的特徵……即健全發育的青年男女的戀愛。」「戀愛」在當時社會共識是附屬於「婚姻」的，而婚姻除了透過自由戀愛得到幸福，更重要的能生育傑出的小孩。但李光洙進一步將「婚姻」與「戀愛」分開來談，認為「沒有婚姻的戀愛是可以想像的，反之則未然。」這個看法得到當時大多數青年的擁戴，讓個人得以想像自主，個人自由得以與家國並存。

二十世紀初期也是台灣社會大量討論婚姻問題的高峰期。從 1895 年日本占領台灣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的勝利，急欲實現「自由」「平等」「革命」等精神的願望充斥人心，亦加速了社會各個方面的改革。在當時公共媒體上看到的關於自由婚姻的論述，總是與倡導文明、種族優越和保家衛國，以及對傳統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批評一同出現。如翻譯自福澤諭吉的〈男女交際論〉已將男女間的

¹⁰ 권보드래, 《연애의 시대: 1920년대 초반의 문화와 유행》(서울: 현실문화연구, 2003年), 頁 15-16。

¹¹ 同註 10, 頁 204。

¹² 如: 〈愛?〉(愛か?) (1909)、《無情(무정)》(1917)、〈愛(사랑)〉(1924)、《有情(유정)》(1933)等。李光洙最知名的作品《無情》1917年開始連載於《每日申報》，因為以純熟的新小說風格與純韓文使用能力寫成，被喻為是韓國現代小說之始。他接續幾篇創作，如〈愛〉、〈有情〉、〈愛慾的彼岸〉、《再生》等皆維持一定的主題：戀愛與婚姻、男性知識分子的道德選擇、女性啟蒙、新舊女子間的對比、新女性的墮落。上述討論請參閱：박혜경, 〈계몽의 딜레마-이광수의 『재생』과 『그 여자의 일생』을 중심으로〉, 《우리말글》第 46 卷(2009年3月), 頁 291-321。

¹³ 見雜誌報導：不著撰者，〈戀愛結婚로맨스〉,《別乾坤》5卷2號(1930年2月), 頁 46-53。

¹⁴ 李光洙, 〈婚姻에 對한 管見〉,《學之光》第 12 號(1917年4月19日), 頁 28-37。

肉慾與禽獸相比，同時又批判男尊女卑之舊習，兩者皆須以文明觀之。其他文章如〈自由結婚〉宣揚「發達愛情。保成黃種。文明進步。羨君青年」；或〈自由結婚辯〉曰結婚者「不獨為男女二者，為子孫繼續也，為社會成立也，為國家保存也。」¹⁵接著在一九一〇年代後期，一系列國際事件、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及社會制度改革為基礎，激起了個人內在性的反思。在這個背景下，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浪漫愛和自由婚姻等現代觀念在中文世界的流通已形成重要的文明化涵義，深深植根於現代社會親密關係的建構中。

例如，一九二〇年代、為「台灣人民喉舌」的台灣民報系列¹⁶在每期都有婚姻相關的社論文章，在提倡婚姻改革同時，也將婚姻與婦女角色、現代教育、傳統家庭價值和浪漫愛聯繫在一起。如「浪漫愛和婚姻皆有保存種族和促進文化的偉大使命。」¹⁷這樣的聲明表明當時知識分子和作家採用的明確的文明意識型態。此外，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起，「婚姻」的討論主題逐漸被「戀愛」主題取代，「戀愛」進一步被理解為與「文明精神」同質，但與「肉體慾望」相斥。又如〈戀愛的進化觀〉(1924)通過達爾文主義進化觀點，將戀愛發展分為「過去之戀愛：肉慾、野蠻的戀愛」「現在的戀愛：形式的、未完全進化的戀愛」「將來的戀愛：是精神的戀愛」，將肉慾以及當下社會的流行視為不文明的形式¹⁸。張我軍(1902-1955)的〈至上最高的道德——戀愛〉(1925)明確地將愛理想化為純潔的神聖精神，與「淫蕩之事」無關，並疾呼「一般可憐的人，對於兩性關係，只知道有性交和生殖作用，而不知有尊貴的神聖的戀愛，這班人實在是沒有生的價值的可憐人……」¹⁹蔡孝乾(1908-1982)的〈從戀愛到結婚〉(1926)則是開篇即拋出婦女問題、以及將戀愛誤用為「亂愛」的男女現象，接著討論

¹⁵ 以上各篇詳細書目如下：福澤諭吉，〈男女交際論〉，《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8日，第6版；不著撰者，〈自由結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7日，第5版；雪，〈自由結婚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7月16日，第2版。

¹⁶ 這一系列出版品包含：《臺灣青年》(1920-1922)、《臺灣》(1922-1924)、《臺灣民報》(1923-1930)、以及《臺灣新民報》(1930-1937)。同一主題及文獻研究請參考：吳婉萍，〈殖民地臺灣的戀愛論傳入與接受——以《臺灣民報》和新文學為中心1920~193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¹⁷ 蘇儀真，〈新時代的婦女與戀愛結婚〉，《臺灣青年》3卷1號(1921年7月15日)，頁61。

¹⁸ 車夫，〈戀愛的進化觀〉，《臺灣民報》2卷11號(1924年6月11日)，頁11。

¹⁹ 張我軍，〈至上最高的道德——戀愛〉，《臺灣民報》第75號(1925年10月18日)，頁14-16。

婚姻形式的限制，進一步提倡戀愛的自主性，以「戀愛比結婚還要大，結婚不過是持續真實的愛的所在。」²⁰這樣的宣言將戀愛從婚姻制度中分離出來。

統整上述殖民台韓兩地對於現代愛的挪用與解讀，有個清楚的共同傾向，即是以「精神性」、「神聖性」、「文明性」等特質，將愛崇高化（sublimated）為社會親密關係的至高標準。然而，正是因為如此將「愛」自然化、透明化的傾向，使得當時的知識分子未能釐清以愛為名生產的文學和啟蒙性論述、是如何在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陰影下展現複雜的權力關係。因此現代「愛」在建構之時也產生了新的現代「性」，這個現代「性」如柄谷行人（1980〔2008〕）所觀察的，是「透過壓抑而存在的新型態的性。」²¹

除了社會內部的矛盾，在上述分析中未能彰顯的問題是：殖民台韓在這波跨國現代愛熱潮中的位置為何？這個問題必須藉由討論「翻譯」問題來回應。台韓知識分子間最受歡迎最常被引用的即是瑞典女性主義者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的《戀愛與結婚》（英文版 *Love and Marriage*, 1911），以及日本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1880-1923）的《近代戀愛觀》（1922）；上面提到的李光洙、張我軍、蔡孝乾等人皆在文章中提及上面兩本著作，而這兩本著作的核心題旨皆是「戀愛至上主義」。其實在殖民時期，台韓兩地引入的現代知識皆是透過日本經手的，這點在當時的中國也狀況類似。但我在此想討論的「翻譯」並非實作或物質上的，而是透過實作導入了什麼樣的、隱含的意識型態。

其一，翻譯在被操作之時，即假設了語言、概念間的對等性。英語「love」以及日語「恋愛」在翻譯成為韓語的「연애」、「사랑」，或台灣知識分子使用的「戀愛」時，幾乎缺少了語言間的協商過程。當然部分原因可能來自同屬東亞漢語圈的中台日韓各地挪用既有的文化遺產，但也因此缺少概念上的調解與梳理。另外，也如後殖民研究者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思考全球地緣政治與歷史書寫時提出對於翻譯政治的質問：翻譯過程中，總是有個定義同等性（equivalence）的社會科學語言，這個超然般的存在代表的是由理性的超語言寫就的一套規則。以查克拉巴蒂舉的例子來說「印地語裡的 *pani* 可以

²⁰ 蔡孝乾，〈從戀愛到結婚（三）〉，《臺灣民報》第 29 號（1926 年 2 月 14 日），頁 14。

²¹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2008 年），頁 111。

被翻譯成英文的 *water*，但（過程中）並未檢視 H₂O 這一至高性的存在」²²。也因此翻譯過程中，兩個異文化間被給定（given）的「可譯性」與「同等性」很少受到質疑。我要進一步點出，不被質疑的同等性也助長了語言（及其代表的、被假定的文化整體）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英語和日語早就有了，台韓也可以或應該要有」，這樣的態度即來自、並再次強化「東－西」「進步－落後」「殖民－被殖民」間的地緣政治、以及二元架構，這也是劃界系統運作的結果。

其二，若進一步追問：在「love」、「戀愛」、「연애」、「사랑」、「戀愛」之上的「理性超語言」是什麼呢？答案或許就在於周蕾（Rey Chow）所觀察的：

民主化的矛盾，或許能以政治經濟學語彙「愛被戀物化為全球通行的貨幣」來說明。「戀物化」在此不只是「主觀的」或「心理的」迷戀過程，也是「商品化」的過程，「愛」即藉此獲得交換價值。而被「戀物化」或「商品化」的、正是愛的「客觀性」或公共透明性。²³

周蕾此處的論點乃來自她對於鴛鴦蝴蝶派文學與五四文人、甚至是當代西方學者三造之間的矛盾關係²⁴，以及五四時期風行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等現象的分析。她進而提出以「女性作為閱讀方法」（reading by the way of “woman”）來揭露鴛鴦派文學論爭、以及啟蒙運動中隱含的主流意識型態：在「愛是平等的」這樣論述背後隱含的意識型態其實是對於傳統女性價值的強化與鞏固。同一時期

²² Chakrabarty, Dipesh,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3.

²³ 引號皆為原文所加；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71.

²⁴ 這部分的簡要論點為：鴛鴦派文學的風行對於大眾識字率的提升有顯著效益，卻因此對知識分子來說產生威脅，五四知識分子因而將鴛鴦派文學斥為缺少社會意識、重複落後語言（文言文體）的低俗作品。周後來比較了夏志清與林培瑞對於鴛鴦派文學的解讀與定位，她的分析是：即使這兩位對鴛鴦派文學都抱持肯定與欲為之翻案的態度，然則各自是為了恢復「文學傳統」與「帝國主義知識」而重新定位鴛鴦派文學。藉此，周蕾將議題拉高至超越單一父權（及性別二元對立）、單一國族內部問題，同時又利用了兩位男性學術權威顧及到的「文學」與「社會性」為後續分析鋪路。另外，若說林培瑞將鴛鴦派文學視為「客觀中立的文獻」即是在重新建構「知識」，進而將它功能化為「削弱西化威脅」、「撫慰社會焦慮」、「引介現代進程」，那為何當時急需將文學賦予上述「功能」的五四知識分子反倒在此收手？周蕾的答案是：鴛鴦派文學體現了「大眾讀寫能力的普及」，這威脅到知識分子的特權性。而上述男性文人則皆忽略女性問題。參見同註 23，頁 56-83。

東亞各地的「賢妻良母」、婦女問題、解放婦女等口號，以及以女性為主角的文學創作，皆是以自由戀愛、文明啟蒙為名衍伸出一套規範女性主體的論述，並由此再延伸出規範其他新興主體（如：兒童、青少年、女學生、同性愛者等）的現代科學論述。而這些規範性論述的出現則是回應帝國擴張與國族建構的慾望，女性的再生殖功能是富國強兵的前提，沒有生殖功能的性與愛都需要被抑制。但是婦女解放或女性啟蒙讓女性產生自主慾望，新女性主體對社會進而產生威脅。新女性與多元性樣態的出現，反而成為自由戀愛不自由的證明²⁵。

三、文學實踐的現代愛：不合格的愛慾

除了翻譯等各種體制介入，「文學」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亞各地現代愛的建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觀察二十世紀初生產的小說，即可發現「愛」在這個時期有其共通特質與功能，然而這樣的描寫在一九三〇年代出現變化，也是本文聚焦討論的兩篇作品所帶有的重要歷史意涵。為了總結上述對於愛和性的社會歷史轉變的分析，我將聚焦一九二〇年代出版的、以「壓制性愛和道德化」來代表人們慾望和性行為的調節的文學作品。正如我將在下方討論中呈現的，自由戀愛的啟蒙暗示，反倒讓「性慾」成為作家認識自身所處世界的手段。這些作品經常圍繞在面對「異常」的掙扎：肉慾、猥褻、或非法的性對象（如娼妓），與其相應的、規範化的社會關係。

在殖民地朝鮮出現的現代愛，與「新小說」的發展時期幾乎一致。被稱為第一部韓國（朝鮮）新小說的〈血之淚〉（1906）²⁶這部著名作品中，女主角玉蓮的婚姻關係既不是傳統婚約的安排、也不是自由和浪漫的選擇。「婚約」在小說中呈現為理性和透明的合約關係，是小說中的青年伴侶為了他們自己的未來協商決定的，且指向職業生涯和更好的生活。這似乎是一種自己選擇的婚約關

²⁵ 參見拙作：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台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年12月），頁101-136。特別是頁108-114的討論。

²⁶ 目前較通行的界定方式為：朝鮮的新小說運動始於1906年7月至10月、李人植在《萬歲報》（만세보）連載發表的純韓文小說〈血之淚〉（혈의 누），台灣則至一九二〇年代（1922年）署名鷗的作者發表白話文小說〈可怕的沈默〉與追風（謝春木）的日文小說〈她要往何處去〉後才標誌新文學的起始。

係，但「不是基於他們之間的愛，而是基於對人們啟蒙的意志。（在當時）沒有空間讓給個人的激情。」²⁷事實上，玉蓮象徵著殖民地朝鮮的命運與追求文明世界的努力過程；同時也暗示了現代性的最終來源，即是西方（美國）。小說中，玉蓮的智能力量的增長、與理想的伴侶的浪漫愛關係、與她曾經失去的父親的和解等內容都發生在美國。但是十年後，玉蓮在美國的未婚夫表示，他和玉蓮已經了解婚姻的自主選擇與重要性，但是玉蓮補充說，婚姻其實不是她的優先選項，因為她想進一步學習，希望有朝一日能「解放」朝鮮婦女，並且教育她們成為愛國公民。

而這種文明意識型態，在同被譽為台灣第一部現代小說的作品〈她要往何處去？〉（1922）²⁸中如出一轍。正如台灣文學研究者張文薰（2005）在她的研究中分析的，這部小說對啟蒙有著明確的指示。透過並置「傳統安排婚姻的不利」和「自由之愛的至上性」，作者正當化改革社會的需要²⁹。小說的主角是一個在台灣的年輕女人，雖然對於自己被安排的婚姻感到不安，但也有所期待。到了小說中段，我們知道她被在日本學習的婚約對象拒絕了；對方堅持反對傳統的婚姻制度，想要自主選擇自己的妻子。女主角在充滿失望和恥辱後，很快地振作並也決定去日本學習。在出發前往日本的船港，她遇到了另一個遭受同樣情況的年輕女人，兩位最後互相鼓勵，決心「點燃台灣女性的革命之火」，「為奴隸台灣婦女努力學習」。³⁰這部小說的女性啟蒙路徑，與〈血之淚〉中女性角色最後的訴求產生共鳴。

在這類以「啟蒙文明」、「合格國民」為訴求的新小說／新文學中，若以「自由戀愛」為推動改變的主題（燃料）時，大多以女性為主角，以此體現女性在加入新型態的社會關係與民族建構的重要角色。然而當場景換為呈現「不合格

²⁷ 권보드래, 《연애의 시대: 1920년대 초반의 문화와 유행》(서울: 현실문화연구, 2003年), 頁218。

²⁸ 追風(謝春木), 〈彼女は何處へ?〉, 《台灣》第4號(1922年7月), 頁41-47; 〈彼女は何處へ?(その二)〉, 《台灣》第5號(1922年8月), 頁66-73; 〈彼女は何處へ?(その三)〉, 《台灣》第6號(1922年9月), 頁64-66; 〈彼女は何處へ?(その四)〉, 《台灣》第7號(1922年10月), 頁56-61。

²⁹ 張文薰, 〈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における「女性」イメージの機能性〉, 《日本臺灣學會報》第7號(2005年5月), 頁94。

³⁰ 追風(謝春木), 〈彼女は何處へ?(その四)〉, 《台灣》第7號(1922年10月), 頁59。

之愛」時，則大多以男性為主要角色或敘述者，女性則成為性慾望的對象，或充當不合格、戀愛失敗的原因。這類型的小說都傾向描繪性慾望——且性慾就意味著主體與其行為的反常，並且與性偏見、內疚等負面情緒、或性病有關。

張我軍是從事新文學運動和在殖民地台灣生產現代愛論述的主要知識分子之一，他致力於翻譯（特別是魯迅與日本作家）和文學批評。他的前三部、也是最知名的短篇小說是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寫成的，標誌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新階段，以及戀愛和性論述的全盛時期。這三部小說中有一部名為〈誘惑〉（1929）³¹的作品，描繪了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在現實和慾望之間的掙扎。主角失業了幾個月後，終於獲得了一筆錢（二十元）；雖然他是家中的經濟支柱，但他最終花了幾乎一半的錢在其他地方。小說開頭他經過公園、先把錢花在茶和香煙，後來更跑去跟朋友打麻將。然而，小說也明示了，他之所以臣服於這些消費商品，是由於他無法擺脫的「性慾望」所引起的，且這種感覺是由感官（視覺、嗅覺、聽覺和觸覺）引發的。小說雖然描寫了凝視、聲音和氣味，但主角努力與「誘惑」抵抗的結果盡是空虛：「他醉了、飽了，但他的心的空虛，卻無法可飽。背後的三個人，嘻嘻哈哈的笑聲愈來愈緊，他愈寂寞了，他的心愈空虛了。」³²

我們可以從小說開篇重新觀察到，主角的空虛來源與真實慾望，即來自於對於「自由戀愛」的追求。從小說的一開始，主角就從遙遠的鋼琴聲中建立了自己的慾望，無法抑制地想像著是什麼樣的人在彈奏琴音，那人「也許是女人吧？漂亮的女人？女學生？我的候補愛人？」³³而想像之人的細膩手指緊緊抓住他的心。從那一時刻起，這部小說的敘述取決於一個「理想的愛」該如何被定義。小說中許多篇幅描寫他在與「時髦女人」相遇時，總是被她們忽略而感到挫敗，而他忍住不去妓院即成了一種補償與安慰（因為這避免成為他未來追求浪漫愛的一個「黑點」）。最終這樣的（性的）挫敗得以「理想之愛」來補償；理想之愛的體現，即在於壓抑性慾。

³¹ 張我軍，〈誘惑（一）〉，《臺灣民報》第255號（1929年4月7日），頁9；〈誘惑（二）〉，《臺灣民報》第256號（1929年4月14日），頁9。

³² 張我軍，〈誘惑（二）〉，《臺灣民報》第256號（1929年4月14日），頁9。

³³ 張我軍，〈誘惑（一）〉，《臺灣民報》第255號（1929年4月7日），頁9。

一九二〇年代出版的多部朝鮮文學作品，與張我軍作品中的數個主題相呼應。韓國現代短篇小說的先驅之一玄鎮健（현진건，1900-1943），在一九二〇年代十分活躍，而此一時期他出版的小說作品中，主角經常深深地鑲嵌在現代愛和性的矛盾中。「愛」在他的成說是「理想」和「不可能實現」的，相反的「性」總是容易發生、且無關緊要。如小說〈墮落者〉（1922）³⁴中描述了主角「我」（韓文第一人稱代詞나）把他的「理想之愛」託付給一個妓生，並經驗了失敗的戀愛。渴望與妓生的理想的浪漫關係，來自於他欲逃避現實（因為孝道），並導致他出國讀書的抱負與野心必須中斷。這種逃避主義被認為是一九二〇年代朝鮮人民的集體心態：一方面受到 1919 年三一獨立運動失敗的影響，政治的挫敗導向精神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也開始認知到「啟蒙理性」的局限性，重新思考殖民地朝鮮的現實問題。現實與精神的不同步，就體現在現代性的矛盾主體中³⁵。

這樣的矛盾精神狀態，經常表現在一九二〇年代小說中的代表性角色，這些角色總是能預期他／她即將面臨的厄運，與邁向毀滅的道路。這個道路可能是性、酒、社會事件或一些內在的強制力，有時則是上列所有事件的加總³⁶；而在這些因素中，「性」是最神秘的存在。〈墮落者〉與玄鎮健在同一年發表的〈蹂躪〉（1922）³⁷都強調了性活動或性慾的毀滅性。在〈墮落者〉中，發生在「我」和妓生之間的第一個性愛場面被描繪為「像被巫婆攻擊，我感到顫抖……認為我肯定不會再來這裡」³⁸。在〈蹂躪〉中，女主角京淑與小說中的伴侶 K 的浪漫關係是基於自由的愛，由此她經歷了第一次性愛。然而，在與「動物本能」激發的 K 性交之後，她感到「K 鬆了一口氣。但他的笑聲聽起來像魔鬼的」³⁹，

³⁴ 韓文原文發表為〈타락자〉於《開闢》第 19-22 期（1922 年 1 月至 4 月）。我的討論基於後來匯集的小說選：현진건，〈사감과 러브레터·빈처：현진건단편집〉（서울：삼중당문고，1993 年），頁 85-154。

³⁵ 感謝審查人提供這方面的提點，讓我更完善一九二〇年代朝鮮知識分子心態的討論。

³⁶ O'Rourke, Kevin, "The Korean Short Story of the 1920s and Naturalism", *Korea Journal*, vol. 17, no. 3(1977), pp. 48-63.

³⁷ 韓文原文發表為〈유린〉於《白潮》第 2 號（1922 年 5 月）。我的討論基於：현진건，〈사감과 러브레터·빈처：현진건단편집〉（서울：삼중당문고，1993 年），頁 78-84。

³⁸ 同註 34，頁 116。

³⁹ 同註 37，頁 81。

她以莫名的恐懼、內疚和悲傷，為失去了的童貞哭泣。由上述小說主題來看，無論出於什麼條件（基於愛與否）和社會關係（合法或非法的），無論角色人物與誰發生性行為，結果都是毀滅。〈墮落者〉中的「我」最終被妓生背叛，感染了她的性病；而京淑遭受了自由戀愛的破滅，陷入悲慘的神生狀態。就如張我軍小說主角遇到的障礙一樣，這些作品都體現了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之愛，與性所帶來的毀滅性結果。

隨著「自由戀愛」的精神性與道德化逐漸強化，一九三〇年代出版的小說更直接描繪人的性衝動與動物本能，並將性行為等同於性病威脅。台灣記者兼作家吳希聖（1909-?）在小說〈豚〉（1934）⁴⁰描繪了一個無辜的女孩阿秀的遭遇。她犧牲自己嫁給一個富有的老人以支持她的原生家庭，但這樣的安排最後失敗，歸因於婚約被取消、阿秀也失去童貞。之後這個家庭繼續因貧窮受苦，年輕女孩阿秀不得不賣淫，最終感染性病，並在故事結束時死去。正如標題所暗示的，阿秀的命運與豬的命運相似，都受苦於身體被剝削（用於生殖和賣淫），最後也都犧牲生命。小說明確批評了傳統的社會等級和階級關係，同時暗示「失去貞操」、「性行為」的後果就是導致疾病。

殖民朝鮮的自然主義作家李孝石（이효석，1907-1942），也透過「性病」體現愛和性之間的衝突。〈染病的薔薇〉（1938）⁴¹這篇小說的標題和主題，靈感來自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同名詩作⁴²，描繪了純潔和美德（即童貞）的喪失。女主角南竹為了實現她作為一個新成立的劇團的職業女演員的夢想而輟學，但她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遇到一位男性並發展了親密關係。最終南竹被這位男性遺棄，後來不得不出賣自己、以籌措旅費回到家鄉。女主角的一個老朋友賢輔，與南竹相遇後，知道女孩的夢想與掙扎，後來也與她發生性關係。他目睹了南竹的經歷與轉變，並說：「（他）不能想像，有這樣堅定的夢想的女孩，七年後，將成為一個夜晚的女人。曾經美麗的花不

⁴⁰ 原文以日文發表於：吳希聖，〈豚〉，《フォルモサ》第3號（1934年6月15日），頁33-47。我的討論以原文為基礎。

⁴¹ 原文發表為：李孝石，〈薔薇병들다〉，《삼천리문학》第1號（1938年1月），頁37-52。我的討論以原文為基礎。

⁴² 發表於1794年的作品〈The Sick Rose〉，於 *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這部詩集中。

僅開始枯萎，而且生病了。」⁴³「病」在此指的同時是失去「德行」和「道德」的病，也是「性病」。

在前述小說中，主角們的經歷遭遇暗示了一種破壞文明的模式：「女性＝性墮落（自願或非自願）＝性病＝對男人的威脅（性病感染）」。⁴⁴這種模式表明，透過現代愛的制度化影響，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傳統關係，從原本一種具體的單向征服，轉變成了一個複雜的規則。也是透過這個過程，愛本身獲得與系統相關的交換價值，並受到各種例外性相（sexualities）的維護，因此只能在某種被規範的親密關係中實現，這體現了我所說的現代性主體之間的「不可及的親密性」，我將在下節透過李箱與翁鬧的生命經驗與作品進一步討論。

四、弛愛之人：李箱與翁鬧作品中的非典型親密關係

在回應殖民現代性與現代愛的諸多殖民作家中，朝鮮作家李箱（1910-1937）與台灣作家翁鬧（1910-1940）共享了許多「非典型」的經歷。兩位作家於同一年出生，分別在三歲與五歲時因本家道業中落被其他家庭領養。然而寄人籬下的身世並未阻饒他們受教育的機會，與同時代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他們能以日文與在地語言書寫（李箱能寫韓文與漢文；翁鬧能寫白話中文與台語文）。他們也都十分嚮往帝都東京，兩人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如願前往，卻也分別於二十七、三十歲的年紀病逝異鄉。除了上述他們短暫的生命中平行的交集之外，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在描寫社會／親密關係的作品中、共有的一種強烈「疲竭」情緒，以及，與娼妓角色的連結。以下我將從這兩點出發，分析其相關性並展示這兩個特質如何表現在他們各自最為人熟知的作品——李箱的〈翅膀〉（날개，1936）⁴⁴與翁鬧的〈天亮前的愛情故事〉（夜明け前の戀物語，1937）⁴⁵——之中，並以其「疲竭之愛」（exhausted love）⁴⁶殖民現代性、以及現代親密關係建構的反面。

⁴³ 同註 41，頁 49。

⁴⁴ 原文以韓文發表為：李箱，〈날개〉，《朝光》第 11 號（1936 年 9 月），頁 196-214。我的討論基於原文。

⁴⁵ 原文以日文發表為：翁鬧，〈夜明け前の戀物語〉，《台灣新文學》2 卷 2 號（1937 年 1 月）。我的討論基於：翁鬧著，黃毓婷譯，〈天亮前的愛情故事〉，《破曉集——翁鬧作品全集》

李箱與翁鬧皆屬於能以流暢日文書寫的現代主義作家世代，在他們出現之前，台朝殖民社會已經歷與殖民日本連動的同化政策（1915-1937）、文化政治（1919-1926）、以及政治運動（一戰後各地的民族自決風潮和大正民主）和挫敗（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和台灣建立議會的請願運動）。這些文化和政治趨勢培養了一代文人，他們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試圖在當地的語言和無產階級藝術運動中寫作。然而，從 1931 年開始，日本軍事優勢加劇並肅清了普羅／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爾後在 1937 年，參與二戰前夕，殖民政府開始嚴格審查殖民地的文化活動。在這些困難的條件下，現代主義作家團體在境外蓬勃發展，特別是在東京的台灣和朝鮮知識分子和文學界，這也包括李箱和翁鬧所屬的文學團體：李箱參與了海外文學派於 1933 年成立的「九人會」(구인회)，致力於現代主義文學；翁鬧則與台灣留日學生在 1932 年 3 月 20 日東京成立的「台灣藝術研究會」密切往來，並在其官方出版品《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 首次發表文學作品〈淡水的海邊〉(淡水の海に, 1933)⁴⁷。

本節聚焦討論的兩篇小說皆發表於 1937 年前夕，彼時日本殖民政府正在加速其同化政策以利戰時總動員之急；也是現代化發展了幾十年後，由僑居「內地」(即殖民母國日本) 與本地仕紳促成發展的布爾喬亞式消費社會、也因殖民地社會高踞不下的失業率與貧富差距而顯得不合時宜之際。在此背景下，李箱與翁鬧的作品經常被視為是現代主義小說的巔峰時期，並最能展現現代個人主

(台北：如果，2013 年)，頁 297-323。

⁴⁶ 本文討論的「exhausted」之意涵，來自後現代理論資源。美國後現代主義作家約翰·巴思(John Barth)在其〈枯竭的文學〉(1967)一文中稱，「枯竭」不是指物質、道德或知識等主題的耗竭，而是指某些形式被用盡，或者說某些可能性被窮盡了，但這並不一定導致絕望。近三十年後，哲學家德勒茲在〈精疲力竭〉(1995)一文提出類似的看法，此專文分析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作品中的人物如何「窮盡可能性」，並且在筋疲力盡後轉化為新的主體。參見：Barth, John,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The Friday Book: Essays and Other Non-Fic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2-76; 以及 Deleuze, Gilles, "The Exhausted", *Substance*, vol. 24, no. 3(1995), pp. 3-28. 而與上述西方理論家、文學家的思考有所共鳴的是，殖民時期的現代主義作家們，透過「現代主義」形式與「愛」的主題面對的、同時是心理與物質的現代性矛盾，並與下方討論的商品化的情感與社會關係有關。經審查人提醒，我將英文的 exhausted、exhaustion 統一轉換為中文的「疲竭」，強調對於現代性追求的「疲勞」與「用盡」啟蒙與敘事形式與可能性之處境。

⁴⁷ 原文以日文發表於《台灣新民報》2 卷 2 號(1937 年 1 月)。我的討論基於：翁鬧著，黃毓婷譯，〈淡水的海邊〉，《破曉集——翁鬧作品全集》(台北：如果，2013 年)，頁 90-91。

體內在的矛盾，以及我所稱的：窮盡「愛」（即文明的象徵）以及「敘事」（即再現自我的方法）的可能性。

在敘事方面，兩篇小說皆以獨白體推動小說情節的開展。〈翅膀〉開頭以第一人稱敘事者「我」向讀者提問「（你）聽過『變成標本的天才』嗎？」並隨之稱「我很愉快。這種時候連戀愛也是愉快的。」（〈날개〉，頁 196）然而讀者將會從後來的故事發展質疑「愉快」從何而來。「我」從來沒有放棄他的（獨白）觀點，故事進展嚴格限於他自己的幽閉恐懼意識，讓這個故事讀來幾乎沒有什麼行動、沒有對話、也沒有角色發展，有的舉動也只會干擾我們對於主述者的看法、判斷的信任。〈天亮前的愛情故事〉的敘事與上述〈翅膀〉所具有的特徵幾乎相同。小說開頭即宣告了：「我想戀愛，一心一意只想戀愛。」（〈天亮前的愛情故事〉，頁 297）愛——更準確地說，是「疲竭之愛」——是這兩篇小說的共同主題，並如前面幾節所討論的，與同時代與其他文學作品共享著複雜性與矛盾性。然而這兩部作品與其他作品的區別在於，這裡的愛與一個「非典型」的對象（即妓女）有關，而不是一般現代／貞操／純潔的女性主體。

李箱與翁鬧都以與妓女的關係而聞名，她們在生活 and 文學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1933 年，李箱與一位名叫錦紅的妓生住在黃海道的白川溫泉養病，也在京城一起經營茶坊；錦紅也在李箱數篇小說作品中出現過，包括〈翅膀〉⁴⁸。翁鬧則在他的第一首詩〈淡水的海邊〉中即曾向一個十六歲、「販賣自己身軀」的女性表達他的愛和同情⁴⁹；而〈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和另一個中篇小說〈殘雪〉（殘雪，1935）皆涉及對於某位年輕的、從北海道來的咖啡館女給的追求。需特別說明的是，兩位作家作品與相關記事中提及的「妓生」、「女給」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娼妓」，我在討論時權衡以「非典型女性」稱之。李箱與翁鬧對這些女性有獨特的欣賞之情，與傳統上的、對於與性服務有關的女性的觀念不同。

⁴⁸ 李箱於 1930 年診斷出肺結核，後於 1933 年搬到黃海道的白川修養，在那裡他遇到了錦紅。李箱與錦紅的關係曾被改編為電影《錦紅啊錦紅》（금홍아금홍아，1995）、《58 年狗年》（58년 개띠，2014），韓裔美國劇作《李箱數到 13》（*Yi Sang Counts to Thirteen*，1999 年），以及韓國劇作《我們的美好年少時光》（깃븐우리젊은날，2008）。

⁴⁹ 詩中明確指出「未到十六正含苞的妳／不得不販賣自己的身軀！」這樣的文句，見：同註 47，頁 90。

翁鬧曾經在他最後一部中篇小說〈港町〉（港のある町，1939）⁵⁰中描述了他對神戶港妓女的反省：

如果有莫名其妙的人把海港特有的這些女人的存在視為國恥，恐怕只會被譏為愚昧吧。外國人遺落在海港的錢，大約有三成其實是靠她們的本領撿起來的，這無疑才是海港的意外收穫。⁵¹

海港的警察署裡頭，每天都會有普天之下的海港皆有的特產——阻街女、賣笑婦被揪進來。那段時間報紙的社會版上，刊登了多少非法賣淫被檢舉的報導啊！這種報導在海港的報上尤其氾濫。這類一無是處的新聞——用當地的俗話來說，就是廢材新聞——像麵種一樣會不斷地發酵。那時候的中學生應該還記得，自己是怎麼從這類新聞開啟了奇怪的幻想，因而增加了自慰的次數。⁵²

儘管與這些女性維持一定的關聯，並帶有同情、傾慕等心情，兩位作家仍然無法與其建立合格、可能的「親密／戀愛關係」。因此可以觀察到，本節討論的兩部小說中有個無法忽視的敘事張力，來自於「讀者理解得很清楚、但被敘述者拒認」的事實差距：即，他們對著不可愛之人（the unlovable）追索愛。因此，兩部小說中的獨白敘事、對於作者們建構主人公的內部性和場景是不可或缺的。在這些場景中，個人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關係隔絕開來，並同時產生批判性內涵。我在此並非指向主角不能愛上這些非典型女性，而是想強調：愛和性皆通過現代化的過程被制度化，因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由他們與不同機制關係形成的。

如前面所討論的，愛的制度化涉及商品化的過程，其中「愛」透過地方文化與外國知識技術之間的交流獲得交換價值。另一方面，「性（慾）」被處理為在資本主義關係中可交換的貨幣和商品（性服務）之間的經濟關係，因此販賣

⁵⁰ 翁鬧著，黃毓婷譯，〈港町〉，《破曉集——翁鬧作品全集》（台北：如果，2013年），頁348-501。

⁵¹ 同註50，頁352。

⁵² 同註50，頁399-400。

性者成為系統中的調解員之一。因此，我認為，愛和性都被商品化為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困擾殖民主體的「不可及的親密關係」。若透過兩部小說的獨白敘事來觀察，與這些女性的「非典型」關係，即是兩部作品共享的「敘事結點」(hinge-point of narrative)：換句話說，只有當主角與同處一室的女性沒有達到與性交或親密關係時，敘事才得以推進。

在〈翅膀〉中，「我」與一個「愛弛」的女人一起生活⁵³。他們兩人共用一個有隔間的房間（房間號碼 33），房間所屬的屋舍有另外十八個家庭。在家裡時，他會蝸居在房間其中一邊的空間裡；夜裡，會有男人造訪他的女人並留下錢——他想知道為什麼他們這樣做？——他會出去在街道上晃蕩，直到他謹慎地認為可以返回的時刻。他非常感謝她為他做的事，包括帶給他飯菜，讓他在另一個空間獨自進食，還有把給他的零花錢留在床頭。但很多事對他來說是一個謎。「她有工作嗎？我不清楚。」(〈날개〉，頁 201) 一天，他試圖將銀幣倒在廁所中來挑釁她，但沒有效果。她不聞不問，只是繼續往他床頭擺錢，雖然他想不到怎麼花那些錢。一天晚上，他回房太早了，因此打斷了女人的工作（她正在招待一個男客）；後來他想知道歉，但昏昏沉沉去到女人房間倒在床鋪上，還掏出五元硬幣給她。對於主述者來說，女人每天的行程幾乎是隨機的。隔天他在晚上出門去了，決心在街上停留夠長的時間，以避免造成前一天晚上的尷尬。「我」擔心自己把握不了時間，又犯錯回家太早，所以他要定點查看火車站（京城站）外的鐘樓，他認為上頭的時間一定是準確的。但熬不到半夜他累極了想回去，路上不巧下了雨，被淋溼的他到家發現客人還在，雖然想避免犯一樣的錯誤，但體力不支糊裡糊塗的又穿過女人房間打擾了她的工作。「我」的心理和身體健康，就這樣持續在困惑、壓力和疲勞下渾渾噩噩。

至此，小說中的場景從一個空間切換到另一個空間，但僅限於三個：「我」的房間，女人的房間，以及殖民地京城（現在的首爾）的街道。敘事在這些轉換間向前推進，而這些轉換皆發生在「我」試圖向女人證明他的愛，亦即，把自己完全從她的日常生活中抽離：例如，「我想到在她回來之前應該離開這裡，

⁵³ 原文：戀愛技法에다자 서머서머헤진，可譯為「戀愛技法生疏」，我將之簡譯為「愛弛」。

趕緊回到我的房間」；「趁她夜裡出門時，我溜出來了」；「我趁她外出不在時，偷偷進了妻子的房間」（〈날개〉，頁 200、204、211）。但當他沒有成功迴避她（愛意展現失敗），他們之間的情感交換（關心、擔心、憤怒或歉意）或身體接觸／交易（「我」唯一一次在女人房間過夜）⁵⁴才得以發生。他們之間的親密性無法達到的原因有兩個：「我」不僅脫離了女人的生活（無法履行應有的關係，也無法加入她的生活方式），也脫離了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無法工作，不知如何生產與消費）。也因此，他無法使用現代生活中的兩個象徵中介，即時間和金錢。此外，他對女人的慾望是透過商品中介的：

一種異國情調、感官的氣味滲入我的肺部，我感覺自己眼瞼垂下。我肯定這種氣味是我妻子身體氣味的一部分。……（她的衣服上）各種豐富多彩的圖案迷住了我。我想我可能有點冒犯，因為我試圖想像她的身體在這些衣服底下的形狀。（〈날개〉，頁 199-200）

我決定今天一定要理髮，我拿起瓶子，取出塞子，一個接一個嗅聞香水。久違的香味讓我的身體燥動起來。在我心中呼喚我妻的名字。蓮心……（〈날개〉，頁 211）

商品（香水、衣物）代替了總是缺席、無法觸及的慾望對象。矛盾的是，在最具匿名性的公共空間、殖民首都的新式建築空間中，他終於感到某種親密感、以及與他人的聯繫。當處在火車站茶室時，他發現這個地方：

很感傷。但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的悲傷，比其他街邊茶室裡繁重的氣氛更讓我珍惜。偶爾的火車車聲於我聽起來比莫扎特更熟悉和親密。我幾次上上下下閱讀菜單上的名字。食物的名字看起來像我早期童年朋友的名字般遙遠。（〈날개〉，頁 210）

⁵⁴ 前面提到，當「我」太早回家打斷女人招待男客（因為他必須穿過女人的房間才能回到自己的空間），「我」因為身心都太過疲累而昏昏沉沉的到女人房間想道歉，卻不支倒下床鋪、無意識地掏出錢幣給了女人。那是小說中他唯一一次在女人房間（工作空間）過夜。

透過閱讀小說中對愛與性交易制度化的理解，上述無法達到的親密關係在〈天亮前的愛情故事〉中表現得更為明確。〈翅膀〉中容易被「誤認」的關係（究竟是夫妻，還是性交易對象）在翁鬧的小說中有了相對清楚的設定，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敘述者和對話者是處於與性服務有關的經濟關係中。然而，在整個故事中，主角與年輕女性同處一室唯一做的只是交談、並告訴她自己異常的性經驗、以及如何渴望理想的愛情。面對年輕的女性同伴⁵⁵，他既不要求愛也不要求性。從故事一開始，主角（隔天就要邁入三十歲），不間斷地談論著三個主題：第一，他的性慾、性啟蒙和性挫折；第二，他對現代科技的怨恨、他的孤獨感、以及他對城市生活的沮喪心態；最後，他在生命走向盡頭之前「唯一的願望和抱負」，就是得到真正的愛。如前面簡短提到的，主角唯一的聽眾是來自「北方雪國」的十八歲、從事性相關服務的女性，除此之外，讀者無從獲知這位女性其他背景訊息或人物性格。如同「蓮心」的缺席之於〈翅膀〉的敘事推展，「來自北方雪國的十八歲女性」是〈天亮前的愛情故事〉中敘事結點、或一個重要的媒介，讓敘述者將他的意識流轉換成一種說故事的形式。雖然主角對話的語調更像是在自問自答、或單方面表述自己的想法，這位女子的存在仍使得敘述得以向前發展，這類的表現方式如下：首先，她無聲的提問（由主述者自己問出問題），使敘述者必須停止無休止地講述同一個話題；第二，她提供敘述者線索，以打開一個新的話題（例如，她的年齡提示了主角切入講述他十八歲左右的經驗）；更重要的是，她代表了「不可能親密性」對象，其功能在於讓主角建立獨白敘事，同時未能實現任何形式的社會關係，甚至是客戶和服務者之間唯一的經濟關係（性服務）也被主角排除。

在小說開頭與結尾，敘述者皆強調自己「想要訴說」的慾望，以及這位女子是他唯一能告白的對象：「就讓我把自己的經歷和想法不誇大也不扭曲地通通告訴妳。」「如果我告訴你，我是連一個可以說這些話的朋友也沒有，你一定多

⁵⁵ 小說透過自問自答，在以下幾個段落提及這位女性的身分：「你是北方的雪國吧。」「你十八歲是嗎？」「你一定從幾十個，不，從幾百個男人人口裏聽到同樣的話題吧？不過。遇見像我這樣意志與行為極端分裂的男人，今夜怕是第一次。啊，我整個晚上躺在你身旁。我多麼希望可以摟住你啊！」最後這一段可以判斷這位女性的職業應是接男性客人的服務性質工作（〈天亮前的愛情故事〉，頁 298、312、322）。

少可以原諒我的失態吧」。然而，他想要訴說的意志，某種程度上與他到訪這位女性的「任務」相衝突。他必須在黎明前離開去工作，在他離開之前，他坦承：「啊啊！我就這麼在你身旁躺了一晚。我是多麼地想要把你抱緊，卻做不到；我一點都不因此自豪，反而覺得羞慚——像我這樣窩囊的人只有被瞧不起，才算人符其名吧。」（〈天亮前的愛情故事〉，頁 297、322）上述狀況中，主角的怯懦和自我鄙視可以透過理解愛的制度化來解釋，即：主角的「告白慾望」和「性的拒斥」具體展現了現代社會同時出現的、對於「精神愛的解放」和「肉體慾望的壓迫」。我在李箱與翁鬧的小說中、以及前述殖民時期現代小說的常見議題中觀察到，鑲嵌在殖民地社會關係中的「無法觸及的愛」，是前述慾望受壓抑的結果，並體現在「疲竭之愛」這個共通主題之上。

作為世紀之交、龐大的現代化進程的一環，現代愛的制度化乃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相交集。我認為，「疲竭之愛」反映了殖民主體精神和肉體的枯竭，更重要的是，亦揭示了帝國現代化道路的意識型態枯竭。若我們回頭看〈天亮前的愛情故事〉小說中高度的緊張感，來自理想的愛情、性慾望和現代日常生活之間的衝突，明確地體現了現代性的矛盾與精神耗損。小說第一部分是主角從十歲開始，即目睹了不同動物（雞、鵝和蝴蝶）的性交場面而衍生的各種不愉快經驗。這些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帶給主角暴力和殘酷的感覺，喚醒他對自己的起源（嬰兒如何出生）的理解，並加速他的（性）成熟（像香蕉）。第二部分始於再次強調小說開頭的宣言，「正如我先前說過的，我只想談戀愛。只能夢見戀愛。這是我唯一熱烈渴望的。像我這樣一個廢材，沒有什麼如希望或理想那麼好的事情。」（〈天亮前的愛情故事〉，頁 303）再次接收到主角的意志之後，我們準備好更進一步了解他對理想愛情的想法或經驗，然而他開始談論起他的性衝動和對一個想像中的理想情人的肉體慾望，因此變得尷尬和不安、坦白並承認，「我是一頭野獸，」活該被譴責（〈天亮前的愛情故事〉，頁 305）。然而，這種自我譴責是跟隨他對現代性的尖銳批評：

我想啊，如果這地上再次為野獸所據，該有多好啊！我不是期望人類滅絕，請你別動氣。我的意思是希望人類把所有的生活樣式和文化全忘

掉，再一次回到野獸的狀態。說實在的，比如說當我看到那些花幾百圓買來不為保暖，而是掛在肩上給人看的圍脖就感到莫名的嫌惡。……還有，比如那個收音機，這東西實在讓人受不了。不管你走在路或坐在室內，那喋喋不休衝撞你耳膜的噪音是什麼東西！怎麼忍受得了。那東西沒讓人類集體發瘋才真叫我覺得不可思議。……以要一想到那些市區電車、汽車和飛機，我就全身發毛。（〈天亮前的愛情故事〉，頁 305-306）

翁鬧在小說裡明顯地將「性慾」和「生活在現代世界的沮喪」並置在一起，進而對於文明的批判、則與恢復原始性慾相連結。這種原始的慾望受到精神（理想）戀愛的鄙視和壓抑，相反的，被賦予文明精神內涵的戀愛，則與商品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現代科技有著共謀關係。無法觸及的愛情、生活在恐慌與危險的科技中，這些身心折磨帶給翁鬧強烈的世紀末之感（fin-de-siècle），暗示生命的破壞就在不遠的未來。他清楚地表示，「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不適合生存的人」；「對自己發誓，如果到了三十歲結束的最後那一剎那我還無緣經歷那最後一秒鐘（與愛人靈肉合一）還沒到來，我勢必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但他也決心自己成為悲劇英雄，把自己與傾訴對象區別開來：「我的破滅可是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天亮前的愛情故事〉，頁 307-308）因為連他自己都不在乎這一切，也因為他們在種族（北方和南方，冷和熱）與年齡的差異。

我在前面提到過，翁鬧逗留東京期間寫就的作品中不斷出現一位「來自北方雪國（北海道）的年輕女子」，考慮到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在北海道進行的殖民擴張，來自北海道的年輕女子實則處在被殖民狀態，並由帝國現代化計畫動員到大城市，來自殖民地台灣的翁鬧也是如此。然而，這些被殖民者並非總是沆瀣一氣，而是根據他們的社會地位被分化為不同的類別。一方面，被殖民者在大都市中透過日常生活經驗的物質和空間的中介而相遇，他們之間有著被結構化的連繫；另一方面，種族、階級、性別、甚至年齡的差異，則是不被處理或隱藏的分化條件，以維持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以及被殖民者們之間）的權力關係。這清楚地揭示了，浪漫愛假設了一個虛幻的自由和平等而非答案，並從而加強了殖民世界中的權力關係。

同樣受現代化欲望驅使而前往東京的李箱，其作品也是透過展現「疲竭之愛」而對殖民現代性提出批判。雖然〈翅膀〉的背景設定是在殖民地京城，但這部小說是在他在東京的最後一段時間，也是身心處在混亂、虛弱和疲勞的狀態下寫成的。李箱曾經賦予東京一個烏托邦式的希望與想像，但就在他 1936 年抵達彼處時，踩上的盡是失望：

我終於到了東京。真是讓人失望。這地方根本沒什麼……無論我走到哪，都沒什麼東西讓感我興趣！〔這個地方〕充斥著以分子式輸入的西方惡習；甚至更糟糕的是，人們將之視為真實，這真讓我感到厭惡。我沒想到日本會是這樣一個粗俗的地方。我本來認為，不管怎樣，東京是不同的，但它名過其實。⁵⁶

當然，把這篇文章看作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殖民帝都必然會遭遇到衝突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事實上經常發生⁵⁷。身心俱疲的李箱，或許真的迷失在日本的核心地帶，因而幾乎無法辨識那他曾經巨幅描繪的、現代性的著名標的物「東京」。在那個時刻裡，作為帝國的流離失所主體，他也同時被「種族化」了。從被殖民者的認知中，殖民現代性所產生的城市經驗、在公共和私人領域之間並不是統一、錯位的。如韓國文史研究者林亨利 (Henry Em) 對小說的深刻見解表明，「〈翅膀〉可以被看作是一整代殖民知識分子，如何在殖民地環境中尋求生存的一個寓言，藉由將生命經驗變成完全私人的、用自我欺騙蒙蔽自己，直到連這些方式都變得沒用。」⁵⁸

這種非常狀態即再現為小說在開頭段落中的象徵：「變成標本的天才」。成為標本的天才，可解讀在日常的殖民生活中耗盡了他的身體和靈魂，「甚至哪天

⁵⁶ 이상, 김윤식 편, 〈사신 6-7〉, 《이상전집 3-수필》(서울: 문학사상사, 1993年)。轉引自: Choi, Won-shik, Janet Poole trans., “Seoul, Tokyo, New York: Modern Korean Literature Seen through Yi Sang’s ‘Lost Flowers’”, *Korea Journal*, vol. 39, no. 4(1999), p. 133. 但也有對於東京的興奮之情，可參見: Yi, Sang, Michael D. Shin trans., “Tokyo”, *MUÆ: A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Production*, no. 1(1995), pp. 96-101.

⁵⁷ 請見金允植的討論: 김윤식, 〈서울과동경사이〉, 《이상연구》(서울: 문학사상사, 2007年), 頁 143-172。

⁵⁸ Em, Henry, “Yi Sang’s Wings Read as an Anti-Colonial Allegory”, *MUÆ: A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Production*, no. 1(1995), pp. 105-106.

就會從充滿這些重複、無常的各種行徑的生活退出。」⁵⁹〈翅膀〉中的「我」在其日常生活中，常人生活的時間是缺席的，任何貨幣交換價值的概念都被拒絕。然而，勞動、金錢和商品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在小說中是透過重組殖民社會中的社會關係而制度化。如果沒有「愛」、金錢這類調解制度，就不能參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不能與他人建立某種社會關係。

上述兩部小說中的主角體現了一九三〇年代末期，殖民地社會中的個人在面對現代與傳統、自我與社會、私領域與公共化等各個場域的矛盾衝突後，自身生活的崩弛、與殖民日常生活脫節、最終展現為永遠無法實現理想之愛，建立親密關係的殖民現代主體。本節討論的「疲竭之愛」，是對殖民現代性的反思思想的標誌。被殖民者耗盡了追求現代的形式和材料，卻只能踏入沒有出路的死胡同；同時，這些經歷也引發了對於殖民現代性及其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批判思考。

五、結語：愛的去殖民

本文透過分析殖民時期台灣與朝鮮生產之文學作品與大眾論述，探究「現代愛」的歷史建構與殖民遺緒，同時以台韓互為參照，以彰顯、挑戰東亞地緣政治問題。以「現代愛」為題，探討二十世紀初期，台灣與朝鮮兩地之殖民親密關係的建構與轉化。我將「殖民親密關係」定義為：透過殖民權力運作而產生的新型態社會關係；在此社會關係裡頭，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出現一種親密性，藉以磨合各類殖民矛盾與社會差異。而「現代愛」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二十世紀初以降東亞各地社會關係的建構與發展；而殖民地台灣和朝鮮，在現代化、國族建構的慾望下，為因應帝國主義及殖民統治，在社會親密關係的發展上也面臨急劇轉變。

⁵⁹ 這種自殺傾向與小說的結尾相呼應。〈翅膀〉的最後一幕發生在三越百貨的屋頂花園，被認為是暗示了自殺的企圖。Lee Kyoung-hoon 則認為，小說的最後一幕實際上發生在街上，而不是屋頂上。參見：이경훈, 〈박제의 조감도—이상의 「날개」에 대한 일 고찰〉, 《사이먼 SAI》第 8 號 (2010 年 5 月), 頁 197-220。

對於殖民台灣與朝鮮來說，二十世紀初期的文學與語言運動密切地與殖民現代性化、國族建構、社會改革等慾望密切鑲嵌在一起；其中，自由戀愛的主題更是同時展現了現代化慾望中解放與壓迫的雙重結構，也作用於縫合社會規範與個人自主的矛盾斷裂。從一九二〇年代起，描寫戀愛主題的小說經常致力於展現戀愛追求與個人慾望間的掙扎衝突，並透過壓抑肉體、性慾來強調戀愛的神聖與精神到道德性。我則在李箱與翁鬧的掙扎中看見，這些衝突矛盾不只是追求「戀愛」的失敗導致，更是被殖民的台灣與朝鮮人在日常生活中處處感到格格不入的生命經驗，也是無法被寫進現代進步史觀的那些「脫隊」的人們共同經驗的窒礙。這些脫隊的人們則經常被劃分在「不正常」、「變態」、「犯罪」的類別中，以警示脫離社會規範的個人追求，依舊是非法且不容於現代文明社會的。

我認為上述討論揭示了，「現代愛」的歷史生成與「知識生產」、「地緣政治」的權力系統密切相關，即：地緣政治主導了當代東亞各區域間的相互關係，並阻礙了台韓間的參照想像；現代愛則在各個社會內部展現相似的主導性，並阻隔不同性主體間的結盟。易言之，本文認為台韓之間參照系統的建立，與社會內部不同性主體間的結盟，皆在回應並擾亂既有的殖民歷史參照系統；而本文最後希冀提出「愛的去殖民」思考，由社會內部向外延伸到國際社會，處理更宏觀的歷史書寫問題。而為了挑戰「現代愛」——需全面性反省「現代愛」的規訓內涵，及其不滿，亦是本文的書寫動機與目的。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江刺昭子，《愛と性の自由「家」からの解放》（東京：社会評論社，1989年）。
- 佐伯順子，《「色」と「愛」の比較文化史》（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
-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2008年）。
- 洪郁如，《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年）。
- 翁鬧著，黃毓婷譯，《破曉集——翁鬧作品全集》（台北：如果，2013年）。
- 張競，《近代中国と「恋愛」の発見》（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
- 이상，김윤식 편，《이상전집 3-수필》（서울：문학사상사，1993年）。
- 서지영，《역사에 사랑을 묻다: 한국 문화와 사랑의 계보학》（서울：이숲，2011年）。
- 김윤식，《이상연구》（서울：문학사상사，2007年）。
- 권보드래，《연애의 시대：1920년대 초반의 문화와 유행》（서울：현실문화연구，2003年）。
- 현진건，《사감과 러브레터·빈처：현진건단편집》（서울：삼중당문고，1993年）。
- Barth, John,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The Friday Book: Essays and Other Non-Fic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hakrabarty, Dipesh,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Frühstück, Sabine, *Colonizing Sex: Sexolog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cLelland, Mark J., and Vera C. Macki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xuality Studies in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ovinelli, Elizabeth, *The Empire of Love: Toward a Theory of Intimacy, Genealogy, and Car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zuki, Michiko, *Becoming Modern Women: Love and Female Identity in Prewar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張文薰，〈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における「女性」イメージの機能性〉，《日本臺灣學會報》第7號（2005年5月），頁90-105。

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台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年12月），頁101-136。

이경훈，〈박제의 조감도—이상의 「날개」에 대한 일 고찰〉，《사이間 SAI》第8號（2010年5月），頁197-220。

박혜경，〈계몽의 딜레마-이광수의 『재생』과 『그 여자의 일생』을 중심으로〉，《우리말글》第46卷（2009年3月），頁291-321。

Choi, Won-shik, Janet Poole trans, “Seoul, Tokyo, New York: Modern Korean Literature Seen through Yi Sang’s ‘Lost Flowers’”, *Korea Journal*, vol. 39, no. 4(1999), pp. 118-143.

Deleuze, Gilles, “The Exhausted”, *Substance*, vol. 24, no. 3(1995), pp. 3-28.

Em, Henry, “Yi Sang’s Wings Read as an Anti-Colonial Allegory”, *MUÆ: A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Production*, no. 1(1995), pp. 104-111.

O'Rourke, Kevin, "The Korean Short Story of the 1920s and Naturalism", *Korea Journal*, vol. 17, no. 3(1977), pp. 48-63.

Yi, Sang, Michael D. Shin trans., "Tokyo", *MUÆ: A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Production*, no. 1(1995), pp. 96-101.

(二) 學位論文

吳婉萍，〈殖民地臺灣的戀愛論傳入與接受——以《臺灣民報》和新文學為中心 1920~193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徐孟芳，〈「談」情「說」愛的現代化進程：日治時期臺灣「自由戀愛」話語形成、轉折及其文化意義——以報刊通俗小說為觀察場域〉（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三、雜誌文章

不著撰者，〈戀愛結婚로맨스〉，《別乾坤》5卷2號（1930年2月），頁46-53。

吳希聖，〈豚〉，《フォルモサ》第3號（1934年6月15日），頁33-47。

李光洙，〈婚姻에 對한 管見〉，《學之光》第12號（1917年4月19日），頁28-37。

李孝石，〈薔薇병들다〉，《삼천리문학》第1號（1938年1月），頁37-52。

李箱，〈날개〉，《朝光》第11號（1936年9月），頁196-214。

車夫，〈戀愛的進化觀〉，《臺灣民報》2卷11號（1924年6月11日），頁11。

追風，〈彼女は何處へ？〉，《台灣》第4號（1922年7月），頁41-47。

追風，〈彼女は何處へ？（その二）〉，《台灣》第5號（1922年8月），頁66-73。

追風，〈彼女は何處へ？（その三）〉，《台灣》第6號（1922年9月），頁64-66。

追風，〈彼女は何處へ？（その四）〉，《台灣》第7號（1922年10月），頁56-61。

張我軍，〈至上最高的道德——戀愛〉，《臺灣民報》第75號（1925年10月18日），頁14-16。

張我軍，〈誘惑（一）〉，《臺灣民報》第 255 號（1929 年 4 月 7 日），頁 9。

張我軍，〈誘惑（二）〉，《臺灣民報》第 256 號（1929 年 4 月 14 日），頁 9。

蔡孝乾，〈從戀愛到結婚（三）〉，《臺灣民報》第 29 號（1926 年 2 月 14 日），
頁 14。

蘇儀真，〈新時代的婦女與戀愛結婚〉，《臺灣青年》3 卷 1 號（1921 年 7 月 15
日），頁 61。

四、報紙文章

不著撰者，〈自由結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7 月 7 日，第 5 版。

不著撰者，〈論說〉，《獨立新聞》（1898 年 2 月 12 日），第 1 版。

崔寅澤，〈男女同等論〉，《大韓每日申報》，1907 年 7 月 3 日，第 1 版。

雪，〈自由結婚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7 月 16 日，第 2 版。

福澤諭吉，〈男女交際論〉，《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4 月 8 日，第 6 版。

五、電子媒體

Laughlin, Charles, "Review of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 July 2011 (來源：https://u.osu.edu/mclc/book-reviews/revolution-of-heart/?fbclid=IwAR19C_WgyCb-thnW8OchwCd6Ll4UIOEYRHL5WxjVSvLyxc6W4ysOjB2vbRg，2022 年 1 月 24 日)。

